

基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教育传播效果分析

胡晓玲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本文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和媒介四个方面梳理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基本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对教育传播效果问题作了批判学派式的分析和建构。

[关键词] 批判学派;教育传播效果;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媒介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识码] A

正如传播效果问题一向是传播学(尤其是经验学派)理论的研究核心,教育传播效果的理论研究也应该是教育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国内学者借鉴传播学理论对教育传播效果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基本上都是秉持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研究视角,“主要从经验事实出发,采用定量研究方法”。^[1]这些研究往往只关注教育传播各要素(教师、学生、教育信息、教育媒体等)静态的特征分析,没有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缺乏必要的人文底蕴。如彭力、曹思芹在《教育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探析》一文中对传播主体的分析为:(1)教师的科学文化水平;(2)教师资历的深浅和声誉的好坏;(3)教师的智力因素;(4)教师的道德素养。^[2]这种影响教育传播效果的因素分析,没有也没法从本体论的角度阐述这些因素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教育传播效果,因而有就事论事、隔靴挠痒之嫌。

现在学界对于教育传播问题的研究,已经越来越主张借鉴和采用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理论。邱婧玲在《传播学批判学派学术思想及对教育传播的启示》一文中揭示了批判学派学术思想对教育传播理论的启示与指导意义。然而,邱婧玲的分析还是比较笼统,例如对教育传播效果方面的分析,最后归结为:“在教育信息传播中,我们更应该强调教育传播的综合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宏观的传播效果,广泛运用信息化教学技术与手段,正确认识教育传播影响的有力性,在教育传播的各种实际目的和效用

传播实现真正的传播绩效。”^[3]尚有语焉不详之感。

的确,如何借鉴传播学批判理论研究教育传播效果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方面,在传播学界研究传播效果问题的基本上属于经验学派,而批判学派侧重点主要在于对传播行为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反思和批判,他们不是不讲传播效果,但是需要一个研究视角的转换,而这个转换还鲜有人尝试;另一方面,教育传播问题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即教育领域的传播活动和现象,它与大众传播所研究的问题和现象还有很大的差别,而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理论主要针对的也是大众传播的对象和问题,如何将这些理论充分消化和应用于教育传播领域,尤其是教育传播效果问题的研究,这显然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尝试做一些浅显的分析和建设工作,以抛砖引玉。

一、传播学批判学派对传播各要素的分析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批判学派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者群体,其内部又分为各种流派。国外学者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倾向于把大众传播的批判和文化理论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学派)、文本分析与文学批评理论(也称解释学理论)、符号互动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等;^[4]而国内学者梅琼林则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包括早期在德国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期在英国形成的文化研究学派(也称伯明翰学

派),以及20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后现代主义媒介批判理论等。^[5]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批判学派的研究范围界定并不一致。基于此,我们宁愿采取一种广义的批判学派观点,即“以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批评社会的弊端,探讨媒介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重视宏观研究”。^[6]凡是符合这些特点的有关传播学的研究,都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

(一)基于传播者角度的分析

传播者研究是传播学批判学派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大众传播中对媒介权力的讨论主要就是从传播者角度进行的。批判学派的主旨就在于证明传播者所具有的控制与操纵意向。《权力的媒介》一书的作者阿特休尔就尖锐指出,“任何媒介都受制于某种权势,都是某种权势的工具”。政治经济学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默克多“通过考察美国电视连续剧的历史,具体揭示了广告主对传播内容的积极干预”,“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以广告的形式对传播活动做了有力的干涉”。英国批判学者N.加纳姆也总结说:“大众传播媒介所设定的‘议程’是一种高度人工合成物,它经过传播者的新闻价值标准过滤筛选,一般采取支持现存制度的立场。”^[7]

丹尼斯·麦奎尔总结了批判学派的观点:“媒介组织似乎是被少数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拥有或控制,而这些媒介组织的类型和目标也都很类似。他们传播由统治集团决定的关于世界的有限、一致的观点。受众被迫或注定要接受所提供的对世界的看法,而没有太多批判反应的余地。”丹尼斯·麦奎尔把这种媒介模式称为“支配媒介模式”,认为其传播效果是“强化、稳固既定的社会秩序”,“对于现存的权力结构产生强化和合法化的作用”,同时,“通过过滤不同的声音而阻止变化”。^[8]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媒介批判理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媒介内容在生产时受到限制,因此不可避免地起到强化社会现状的作用,而且还在破坏那些推动有建设性的社会变迁的努力”。^[9]

(二)基于传播内容角度的分析

在批判学派看来,传播内容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当代大众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对意识形态作了如下定义:“(意识形态)一般指由传播者散布或增强的一些系统化的信念体系或者一套价值观。尽管大众媒介一般并不会故意地宣传意识形态,不过在现实中,大多数(或所有)的媒介内容会通过选择性地强调特定价值与规范,潜在地散布意识形态。”^[10]这里的意识形态定义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

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理论,而是指在大众传播过程中附加到传播信息中的一些特定的观念体系或价值体系。

英国文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将意识形态理解为“那些提供框架让我们再现、解释、理解、澄清社会存在的某个方面的图像、概念和前提”。^[11]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经验学派的所谓“社会合意论”,认为媒介信息只是虚伪合意的制造者,媒介并不止于消极地传达新闻和消息,而是积极地从事着某种有意识的灌输活动,它在意识形态内容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充当着重要角色。^[12]倡导美国文化研究的詹姆士·凯里认为大众传播“不指向讯息在空间中的拓展,而指向社会在时间上的延续;不是一种告知信息的行为,而是一种共同信仰的表现”。^[13]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也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制造并传播种种幻想和神话,从而把人们淹没于其中;二是把现实的真相压入无意识领域,阻止人们去觉察事实的真相。”^[14]这样的后果将是:一方面,有助于统一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意识,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阻碍人们获得真知和自由思想,从而使受众丧失自己的个性,成为被“异化”的人。

(三)基于受众角度的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代表马尔库塞提出了著名的“单向度的人”的理论。他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特殊的利益集团依靠技术的进步不断创造一些压抑个性的生活方式或权力,并随着产品的普及,各种“虚假的需求”以灌输的方式被强加于个人,从而使个人成为丧失了合理批判社会现实能力的、畸形的“单向度的人”或者异化的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15]

哈贝马斯从现代性批判的哲学角度提出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概念,以规定受众的两极性特征。其中,“生活世界”的概念用以说明作为交往理性的受众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所共同拥有的庞大而不明的指引性的背景资料 and 知识,是受众理解活动可靠的“背景信念”;而“系统”则是指现实社会中经济(市场)和政治等控制性组织或制度。在哈贝马斯看来,产生现代社会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殖民化”。作为受众相互理解的基础的“生活世界”日渐沦为“系统”控制的对象,受众在私人经济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

中的自主性被扼杀,“在社会变迁中,受众的文化认同危机以及个体信念矛盾,都是大众传播活动中时刻遭遇的现象”。^[16]

从本质上讲,批判学派对于传播受众的考察焦点主要集中在受众的异化问题上。所谓异化,通俗地讲,“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蜕变为脱离生产者,而且同生产者相对的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生产者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完全丧失,遭到本来由自己创造而现在却成为异己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奴役”。^[17]现代大众传播要想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努力克服受众的各种异化现象,克服所谓“大众文化”的非大众性,尽量去除各种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相违背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的剥夺性控制作用,真正还原受众原真的“生活世界”,还原受众的个性和自由。

(四)基于媒介角度的分析

首先从媒介/渠道的角度进行系统的传播学研究的是加拿大学者英尼斯,他“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18]英尼斯之后,麦克卢汉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讯息”的理论,认为媒介不是传播信息的渠道,而是延伸人体的器官;媒介本身会引发社会生活方式的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生活方式,就是媒介本身所携带的信息;“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语言,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19]麦克卢汉之后,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兹也提出了“一种以情景论的视角考察媒介的社会影响力的媒介理论”。^[20]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梅罗维兹的媒介理论,都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具有唯技术决定论的特点。

但是,上述媒介理论都不是批判学派的理论。批判学派的理论主要表现在对上述理论的批判之中,最典型的是英国学者威廉斯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批判。“威廉斯力主在研究传媒变迁与社会变迁中不能把科技从社会中抽象出来看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威廉斯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批评,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该理论避而不谈社会意向问题”。^[21]他认为,麦氏所声称的对人类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科学技术发明,其本身还应该以现实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意向为前提,因而,真正的决定因素绝不是单一的技术发展,而应该是科技、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

传播学者丹·席勒又“把网络技术的发展置于同社会经济和制度的互动之中进行考察,提出了一种关于因特网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即“数字资本主义”论。席勒的媒介理论可谓与威廉斯的媒介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传播学批判学派对教育传播效果研究的启示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虽然在经验学派看来有疏于行动的空谈之嫌,但是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思考问题的维度,其总体立意还是相当深刻的。在经验学派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和吸取批判学派的观点,实现两个学派思想资源的优势互补,克服彼此相对的缺陷和不足,必将有力推动各类传播问题——尤其是传播效果问题的深入研究。教育传播效果问题作为大众传播效果问题在教育这一特定领域的实践运用,有必要借鉴和吸取批判学派的观点,促进教育传播效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传播者的角度:去权力化,以人为本

批判学派对传播者的批判分析告诉我们,媒介组织或机构的权利控制将对传播效果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因此,在教育传播过程中,我们在分析教育传播者,即教师的因素时,除了强调“教师的科学文化水平”、“教师资历的深浅和声誉的好坏”、“教师的智力因素”、“教师的道德素养”和“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能力”^[22]等这些传统的因素外,还必须要进一步开阔我们的思路,寻找制约教育传播效果的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从批判学派的观点看,权力的影响因素也许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而且,这里权力的主体不仅仅是教师,还包括教育传播组织如学校等。要取得良好的教育传播效果,就必须要去掉权力化,实现以人为本。

在学校教育传播体系中,权力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学校过度僵硬的教学管理体制。体制本应为人所用,要以学校的主体——教师和学生为中心,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若体制僵化保守,固步自封,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就可能适得其反,失却人性,扼杀个性,反成为教学传播过程中的羁绊因素。(2)学校重大问题决策的民主程度。民主则教师和学生参与教育传播活动的主动性强,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教育传播也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反之,教育传播的效果也就肯定会削弱。(3)教师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阅历背景。一人一背景,背景与背景不相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背景甚至不

相通,这是客观事实。但有些教师动辄以“我当年怎么怎么”去教训学生,而不是设身处地去宽容、体谅和引导学生,势必造成师生的对立情绪,影响教育传播效果。(4)个别教师的专断作风。传播者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不分是非,误人子弟,则教育传播效果肯定好不了。

(二)传播内容的角度:去意识形态化,实事求是

批判学派对传播内容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上。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上的概念,而是指信息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内容中所附加和隐含的与人民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各种价值观念和信念体系,因此它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与真正的大众文化精神相背离的一种畸形的文化理念。在其影响下,各种原本真实的传播信息经由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变形,从而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和被迫表达工具。传播信息的扭曲和失真也会导致传播效果的扭曲和失真。教育传播效果研究从以上理论获得的启发应该是:要坚决去除各种与大众文化精神相背离的意识形态,确保教育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后者作为目的是传统的教育传播效果研究都注意到了的,^[23]但是重要的是前者。

要去除意识形态化,保证教育传播的良好效果,就必须要注意以下三个环节:(1)教育传播的目标(或计划)环节。我们的教育目的是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对于“智”和“体”两个方面,我们制定的教育目标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符合经验实证主义传统的。但是对于“德”的目标如何制定,经验实证主义并不能给出好的办法。我们必须借鉴批判学派的观点,首先过滤掉许多不正当的意识形态预设,切实深入到学生的生活实际之中,了解广大学生的真实需求和根本利益,制定合理可行的而不是空泛虚假的道德目标,并力求切实实现道德要求的内化,而不是为了完成道德教育任务的各种道德形式主义等。(2)教育传播的实施环节。要确保教育传播内容避免不正当意识形态的干扰。有些教育传播者基于自身的某些道德缺陷或私人利益,无意或有意向学生传播各种消极的甚至不健康的价值观念等,误导和贻害学生,教育传播的效果自然也就无从谈起。(3)教育传播的评价环节。很多教育传播者在评价教育传播效果时,也经常设定一些不合理的意识形态作为评价标准,动辄给学生存在的各种小问题扣大帽子,比如以共产党员最为崇高的无私奉献精神来批判普通学生大众正当的个人利益要

求,以公共生活领域的集体主义精神干涉属于私人领域的学生正常的个人生活等。这样的道德苛求往往会引起学生的不满,从而失去教育传播的实际效果。

(三)受众的角度:去异化,回归真实主体

作为传播效果直接体现者的受众的异化状态,是批判学派给我们教育传播效果研究带来的重要启示和警示。要取得较好的教育传播效果,去除受众的异化状态,回归受众的真实主体性,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再仅仅满足于从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因素”(心理的、身体的、观念的、能力的等)和“意见领袖”的榜样作用等方面来阐述教育传播效果的受众因素,^[24]而应该直面各种异化现象,找到真正克服的办法。

有几个具体的方法,可以让教育传播者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受众的异化,提高教育传播的实际效果:(1)调查研究的方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就是要尽量客观地了解受众的现实状态和真实需求,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将教育传播直接深入到受众的心坎上。(2)平等讨论代替一言堂灌输的方法。后者,即一言堂灌输的方法极易被(教育传播者的)权力系统(机构或话语等)所利用,成为压制受众心灵的异化来源;而前者,即平等讨论的方法(不只是讨论,因为不平等的讨论也会在心理上预设权力中心的存在),是真正的心灵对话,是真实主体之间的真实交流。(3)动手实践(just-do-it)的方法。将空洞的教育传播口号转化为切实可行(必须是受众本人认为切实可行)的实践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受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教育传播效果也能得到确实的保证。(4)自主学习的方法。让受众在自主学习中获得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使其能够自己获取、分析和辨认真实的或虚假的信息资源,不至于像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中经常受到的欺骗那样。现代网络是这种自主学习的一种有效媒介。自主学习的方法是受众克服异化现象的一种最为积极的和本质的方法。

(四)媒介的角度:去技术神话,返璞归真

批判学派所批判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在教育传播领域的表现就是如下观点:越是先进的媒介越能提高教育传播的效果。但是实际上,影响教育传播效果的因素绝不仅仅是媒介,我们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与媒介因素一起共同决定教育传播的实际效果。因此,我们在进行教育传播效果研究时,一定要努力去关

于媒介技术的神话或迷信,将我们的目光投向真正的教育传播活动之中,在这个活动中,媒介仅仅只是一种工具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树立如下两种观念:(1)教育传播是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开发先进的教育传播媒介,而只是运用一定的媒介将一定的教育传播内容传达给受众的一种教育传播活动而已。从倚重媒介向突出教育传播目的的转变,是一种返璞归真,是真正走向教育传播的科学的认识和实践。所以一定要尊重教育传播的规律,坚持教育传播在先而不是媒介在先,从而防止媒介的滥用。(2)媒介不分优劣。不同的媒介只是特性不同,没有优劣之分。比如,虽然“多媒体教学具有字体标准、排版整齐,并且可以产生色彩丰富的内容;图形、图片、

动画、声音都可以出现在课件的演播中,可以有多种机动灵活的演播方式等等特点,所以就能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来同时刺激学习者的注意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多媒体“比单纯的板书或者听收音能起到更好的效果”,^[25]因为多媒体教学同时也具有使学习者只能够被动接受刺激信息,不能够有效调动学习者主动接受信息、构建知识体系的积极性的特点,而后面这一特点也正是多媒体教学的缺点所在,传统的板书或者听收音机正是在这一方面具有多媒体教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只要能够达到教育传播的目的,采用什么样的媒介都是无可厚非的。只有树立这种观念,我们才能在教育传播实践中有效地防止媒介的攀比之风。

[参考文献]

- [1]段鹏.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外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76.
- [2][22][23][24][25]彭力,曹思芹.教育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探析[J].新余高专学报,2008,(6):112~114.
- [3]邱婧玲.传播学批判学派学术思想及对教育传播的启示[M].电化教育研究,2009,(10):27~30.
- [4][9][11][13]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27~240,225,232,235.
- [5]梅琼林.方法论: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比较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3):134~140.
- [6]李舒.传播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92~53.
- [7][12][14][17]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322~325,322,322~320,326.
- [8][10]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8~59,420~421.
- [15][16]臧海群,张晨阳.受众学说:多为学术视野的关照与启迪[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22~125,130~132.
- [18]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2):40~47.
- [19]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4.
- [20][21]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19,95~100.

(上接第43页)

- [11]林万新.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09,(8):56~57.
- [12]许康,于衍平.科学技术体系的建构基础及演变方向探索[J].科学学研究,2006,(2):170.
- [13]钟柏昌,李艺.我国教育工程学的现状反思与发展启示[J].电化教育研究,2006,(8):7~8.
-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 [15]刘庆昌.教育工学初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3):2.
- [16]李子运.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J].中国电化教育,2007,(5):21.